

中华历代诗词精品译析

元曲

三百篇译析

刘兴汉 吕树坤 编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中华历代诗词精品译析

元曲三百篇译析

刘兴汉
吕树坤

编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[吉]新登字04号

中华历代诗词精品译析

元曲三百篇译析

刘兴汉 吕树坤 编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1.375印张 491千字

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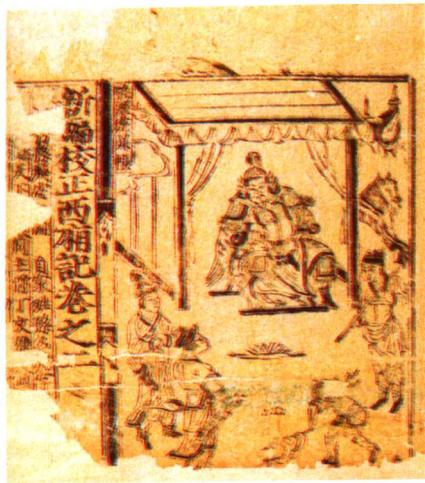
7插页 印数: 1—6 210册

ISBN 7-5385-1208-x / I·262 定价: 33.80元

诗 词

曲

賦



元末明初刻本
《西厢记》残页



辽代散乐壁画



金代杂剧陶俑



元杂剧壁画

白杭新刊的本關大王單刀會

寫一行上
外末上
秦住云

駕六
外末云住

正末打雷風上
住

秦住云
翠思云

今日三

已

空恐到于戈又交生
靈夢舌您殺妻而每也合

濂天子附

場去見孔數子
駕云

陛下萬歲
微目爆九那

利州不可取
駕又云

云不可去
心

有本以復國目的
他妄喜歡與心

同官日五

處鎬刀併了畫真珠了表招

存的孫劉曹操平

一國後三朝不付乞阿嘴海晏而順足訥

兵器改為器用征

撫不動酒旗軍嚴威馬源頭余氣敵陣雲濶

將校作日條

脫金甲首羅袍披前旗捲虎幡革

間紳士看戰勝治的民

安國恭却又甲將老江面

駕云
合令與它這上九洲

當日曹操本赤兔

吳生被那兄弟每當社

智末云住

第一折

新鐫半夜雷轟福碑雜劇
元東駕馬致遠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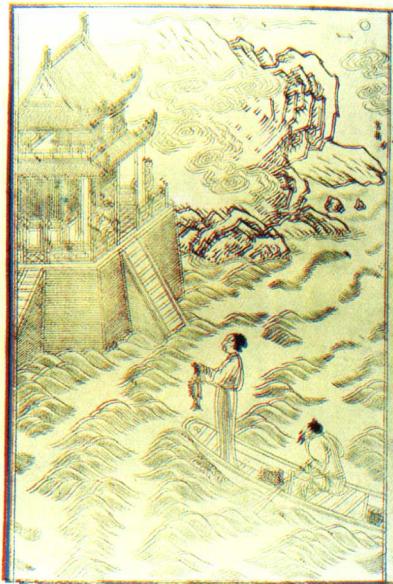
萬富界
沖末范仲淹同宋公序上龍樓鳳閣九重城新華沙
堤宰相行我貴我榮完莫慕十年前是一書生老夫
姓范名仲淹字希文幼季進士及第除中甲第以來
官學擢用頗有政聲今謝恩可伶除老夫為太子少
序老夫有一同堂小弟姓張名鑄字邦友姓宋名公
編濟虫之才補穿天地之手自與兄弟開闢以成老夫
功名也流落四方老夫常切於心舉于念今奉
聖人命着老夫大江南採賢士宋公序相公有甚麼
事止有甚麼好別無他事止是張鑄數歲不能相會未
知道取功名也便索登程相公有甚麼話說宋哥：你
州爲理今日便索他事止是張鑄數歲不能相會未
知道取功名也便索登程相公有甚麼話說宋哥：你
哥已行也別無他事止是張鑄數歲不能相會未
知道取功名也便索登程相公有甚麼話說宋哥：你
這門親事哥：你哥哥公故心我有
一同堂小弟姓宋公序相公有甚麼話說宋哥：你
哥哥公故心我有
一同堂小弟姓宋公序相公有甚麼話說宋哥：你
哥哥公故心我有

明刻本马致远《半夜雷轰荐福碑》

元刻本《关大王单刀会》



杂剧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



杂剧《望江亭》

前　　言

元曲与唐诗、宋词并称，实际它包括杂剧与散曲两种不同体裁的文学形式。古人之所以合称为“曲”，是因为作为杂剧主要部分的唱词，和散曲一样，都是按曲调填写，并配乐歌唱的。散曲无宾白、科介，伴奏亦不用锣鼓，所以又称“清曲”^①，以区别于戏曲。

散曲是金元时期在我国北方出现的一种新诗体。它是在“俗谣俚曲”的基础上产生的。曲牌中之〔货郎儿〕、〔山坡羊〕、〔豆叶黄〕、〔采茶歌〕等，据其名称就可知它们原为市井、乡间的俚曲。宋金以来，随着词的衰微，北方涌现了大量的俗谣俚曲，结合当时流行的少数民族音乐，即所谓“胡乐蕃曲”，并吸收了宋词与当时蓬勃发展的说唱、杂剧等形式的丰富养料，便逐渐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诗歌形式^②。

社会生活在不断发展变化，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也在发展变化。宋元以来新词汇不断出现，双音词、多

音词的增加以及虚词的发展，再加之以音乐的变化，少数民族音乐的羼入，就势必引起诗体的变革^③。所以散曲的兴起既是社会的需要，也是我国诗歌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，同时也是国内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。

在元代，散曲被称为乐府或今乐府^④。至明，朱有燉的《诚斋乐府》始见“散曲”之名，是专指小令，用以区别于成套的套曲或剧曲。近代吴梅、任讷等人才把只用于清唱的曲称为“散曲”，从而把它和有宾白、科介，用于演述故事情节的剧曲，即杂剧区分开来。

散曲分小令和套曲两大类。小令又叫“叶儿”^⑤，是单支曲子。它是按照不同曲调创作的长短句歌词。每个曲调都有它固定的名字，如〔山坡羊〕、〔天净沙〕、〔水仙子〕、〔折桂令〕等等。据元·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与明·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所记，北曲共有三百三十五个曲调，而经常使用的不过四十余调而已。这些曲调分属于十二个宫调，常用的也不过正宫、中吕宫、南吕宫、仙吕宫、黄钟宫与大石调、双调、商调、越调等五宫四调。小令中还有带过曲与重头小令等特殊形式。带过曲是三支以下曲子的联合，须同一宫调，音律衔接，一韵到底。如双调的〔雁儿落带得胜令〕，南吕宫的〔骂玉郎带感皇恩、采茶歌〕等。重头小令是由同题同调、内容相联，首尾句法相同的数支小令组成，支数不限，每首可各押一韵，各曲也可单独成立。套曲也叫套数，是由同一宫调两支以上曲子组成的组曲。每套末有尾声，个别没有尾声的以带过曲作结。全套必须同押一韵。

散曲作为诗体的一种革新和发展，在形式体制上具有与诗词不同的特色。它增加了句子的长短变化，少则可一字，多则可二十余字，使之更接近口语。同时又可增加衬字，使句法灵活多变，从而就更富于表现力，也更具有生活气息；它用的是北方话的音韵，一方面用韵甚密，甚至一句六字三韵，不少曲牌是每句都协韵，而且即使是长套也必须一韵到底。另一方面又可平、上、去通协。由于北方话无入声，所以实际上是四声通协。而且韵脚字可复用。这样就使得它既音调和谐优美，富于音乐感，又具有一泻无余的气势，就更能体现出散曲那种豪辣坦直的特点；此外，散曲的对仗形式也比较丰富。常见的有两句对的“合璧对”，三句对的“鼎足对”，四句对的“连璧对”。还有隔句对的“扇面对”，甚至有通篇皆对仗的“联珠对”等等。多种形式的对偶，就使得它在长短句的参差变化之中见严整，易于歌唱诵读，也避免了散文化的弊病。

散曲和诗词不仅在形式体制上有不同的特点，在总体风格上也有所不同。任讷先生在《散曲概论》中曾经把词与曲的风格作了详细的比较，他说：“词静而曲动，词敛而曲放，词纵而曲横，词深而曲广；词内旋而曲外旋，词阴柔而曲阳刚；词以婉约为主，别体则为豪放，曲以豪放为主，别体则为婉约；词尚意内言外，曲竟为言外而意亦外。”在对比中，会使我们体会到散曲的风格特征。与诗词相比，散曲更为平易通俗，率真自然。它多用口语、俗语，是“方言常语，沓而成章”^④所以明曲家王骥德说：“诗与词不得以谐语方言入，而曲则惟吾意之欲至，口之

欲宣，纵横出入，无之无不可也。故谓：快人情者，要毋过于曲也。”^⑦它善于以白描手法，将常见事物化入诗境，很少堆叠故实。诗词多用“比兴”之法，造成含蓄、蕴藉的意境；而曲则多用“赋”法铺陈，抒写情怀真率、直露。所以清初黄周星说：“曲之体无他，不过八字尽之，曰：少引圣籍，多发自然而巳。”^⑧散曲正产生、发展在一个通俗文学盛行的时代。小说、戏曲、说唱等新兴的文学体裁，必然要给它以深刻的影响，决定了它必然要带着那个时代的特色，从而开创了一代诗风。

散曲的形式灵活多样，和词相比有更大的容量。抒情、叙事、咏物、写景，甚而至于讽刺、谐谑无所不能。因而它的题材宽泛，内容丰富，雅俗兼容。既有诗词所表现的传统内容，如政事得失，忧国哀民与骚人墨客的触景生情，抒写怀抱，也有市井细民、贩夫走卒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散曲作家约二百余，现存元人小令三千八百首，套数四百七十余套^⑨。散曲为通俗文学，一向被正统文人所歧视，虽有所作，编印成集的不多，因而多有散佚，民间的创作无人收集就更难以存留，因而元代的散曲，实际远远不止此数。但即就现存作品而言，也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元代这个特定时代的时代风貌。

有的作品是慨叹世情、愤世嫉俗。或慨叹权豪势要的倚仗权势横行霸道，或慨叹社会的贤愚不分，是非颠倒，或慨叹仕途的险恶，世人的争权夺利……对元代社会的黑暗有所揭露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和

愿望。正因为作家们不满现实，所以才希图逃避，所以元人散曲中向往归隐田园的作品就非常多，所谓“恬退”、“挂冠”、“山居”诸题，就表现了作家们不愿与世沉浮、洁身自好的志趣与愿望，往往在故作旷达的言词之中蕴含着滴滴血泪。当然，这些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消极避世的悲观情绪，甚至感叹人生如梦，富贵无常，鼓吹及时行乐，这些我们就要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去理解了。也有的作品描绘自然景物，或写山川江河的雄奇壮美，或写渔村、花溪的秀丽明媚，这类题材可以说是作家厌倦现实人生，想在大自然中获得慰藉的一种表现，因而往往和叹世归隐，咏史抒怀联系起来。元人散曲中咏史怀古之作不算太多，且大多借以抒发作家的人世沧桑之感，既有不平和愤慨，也表现了人生如梦、富贵无常的消极情绪。除此之外，也有些很有思想价值的作品。如睢景臣的〔哨遍〕《高祖还乡》套数对流氓皇帝的嘲讽，张养浩的〔山坡羊〕《潼关怀古》对历代兴亡实质的揭示，张可久的〔卖花声〕《怀古》对统治阶级战争的控诉等等，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。元人散曲中歌咏男女恋情和描写闺怨的作品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这些作品往往极富民间歌谣的特色，有些描写十分真率、大胆，甚至细致地表现了偷情、幽会中的情态，心理，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。但也有作品写的就是青楼调笑，难免存在一些庸俗甚至猥亵的成分。上述元代散曲叹世、归隐、咏史、恋情四大主题，只是一个总体的概括，是就其基本状况而言^⑩。此外也还有少数相当重要的作品不在此范围之内。如刘时中的套

曲〔正宫·端正好〕《上高监司》对元末江西大旱时灾民惨象的真实描绘；无名氏小令〔醉太平〕对元末政治腐败的无情揭露；杜仁杰套曲〔般涉调·耍孩儿〕《庄家不识勾阑》与关汉卿〔南吕·一枝花〕《不伏老》对当时勾阑演出情况和书会才人生活的描绘，以及关汉卿〔南吕·一枝花〕《杭州景》对杭州繁华景象的描述，也给我们提供了元代都市生活的资料……总之，元人散曲虽然在内容上有所开拓，但却不如传统的诗词那样丰富、深刻，表现民生疾苦、抨击封建统治，特别是正面表现人民群众反抗精神的作品极少，多为放荡不羁，避世求隐，缺少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。但是元人散曲毕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艺术反映，从中同样可以使我们认识到那个社会的种种情况。它仍不失为我国文学史中的瑰宝。

元代散曲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：从金末元初到元中期的延祐年间为前期，创作活动的中心在大都。这时期散曲从民间创作转入文人手中，创作走向全面繁荣。一部分作家是高官显贵，开始有杨果、刘秉忠、胡祇遹等，他们的作品尚未摆脱传统诗词的路数，其后的卢挚、姚燧等人，虽然创作风格仍偏重于典雅，但时有清新之作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；另一部分作家是“书会才人”，如关汉卿、白朴、马致远等人。他们才最能代表这一时期散曲创作的成就。尤其是马致远，他开拓了散曲创作的题材，提高了散曲的艺术境界。他的作品更为全面地显示了散曲这种新诗体的艺术特色。然而这一时期还没有专攻散曲的作家，作品题材也比后期狭窄，正面反映社会现实的作

品尤为罕见。从延祐间到元末是元代散曲创作的后期。创作活动的中心逐渐南移至杭州。出现了一大批专攻散曲的作家，如张可久、贯云石、徐再思等人。创作逐渐走向典雅工丽，讲究格律词藻，对形式美有更多的追求，使散曲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本色、质朴的风格。而在创作题材上则有所突破，出现了像刘时中〔正宫·端正好〕《上高监司》那样深刻暴露元代后期社会现实的作品，惟其罕见，更觉难能可贵。在散曲创作大繁荣的形势下，元代后期出现了一批理论杂记著作和散曲总集。理论杂记如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、芝庵的《唱论》、钟嗣成的《录鬼簿》等。散曲总集如杨朝英编选的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太平乐府》等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年来元代散曲创作的实际情况。

本书名为《元曲三百篇译析》，是从诗体这一角度编选的，因而所选作品以小令为主，适当地编选了一些套曲。为使读者了解“元曲”的全貌，也从曲辞的角度编选了少量杂剧作品。不仅未选全剧，也未选全折，不过在一折中选了数支曲子，多少酌情而定。全书共选了小令二百五十五首，套曲二十七套，杂剧十八折。小令中有“重头”，个别两支小令内容相互连接，便选在一起，作为一篇。因而本书所选实际已超出三百之数了。所选散曲作品，皆以隋树森先生所编《全元散曲》为底本（当然有个别的作品《全元散曲》未收者除外），所选杂剧作品，则以《元曲选》为底本。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校勘工作。编选的原则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，而在思想内容上则注意

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审视，未作过苛要求。元人散曲流派繁多，风格各异，或豪放，或清丽，或端谨沉郁，或诙谐滑稽。编选中也注意到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。对人们所熟知的、历来评价较高的知名之作，更注意不使之遗漏。每篇除原文之外，都有注释、今译、解析三个部分。这三个部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，相互补充、相互印证，以达到深入理解作品的目的。注释力求简明、准确，各篇有重复者，如是较为难懂的词语则不避，以免来回翻检之劳；译文之难在于难传达出原作的意蕴与韵味，笔者只能在力求准确的基础上尽力而已。因有译文，则每字每句都要给以肯定的解释，不容逃避，许多难解之处并无参照之便，只能凭笔者的理解，或有不当，在所难免，只有请读者教正了；解析则注意抓住原作的特点，力求明了、简洁，不作更多的征引。同时，每位作者在第一次出现时，还在原诗前对其生平事迹，创作成就作了简要的介绍。在编写过程中，曾参阅了国内已出版的有关著作，恕不一一列举，谨致谢意！本书虽然是一本普及读物，但笔者未敢稍怠，只是限于水平，缺点与错误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
本书原定由笔者一人完成，但因时间紧迫，惟恐草率，便请老友诗人吕树坤兄共襄其事，小令徐再思的作品之后，套曲亢文苑的作品之后，以及杂剧贾仲名与无名氏的作品共四折，便都出自他的手笔，这里一并致以谢意！

注： ①明张楚叔、张旭初所编之《吴骚合编》即称散曲为“清曲”。近人
— 8 —